

2015年

第1辑(总第12辑)

Review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演化与创新 经济学评论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 主办
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 协办



科学出版社

**Review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

2015 年第 1 辑（总第 12 辑）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 主办
中国演化经济学会 协办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致力于介绍近些年来在西方蓬勃发展的演化经济学以及该理论范式主导下的创新经济学,展现中国学者在演化经济学这一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中取得的成果,并为中外学者就演化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及其应用问题的讨论和对话提供平台。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专辑收录的论文,除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R. Nelson)教授关于“为何熊彼特对当今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一直如此微弱,为何这种状况可能正在改变”和何塞·加布里埃尔·帕尔玛(José Gabriel Palma)教授关于“资本项目向高度流动性的金融市场开放如何导致拉美两轮半的‘疯狂、惊恐和崩溃’周期”的两篇特稿外,还有贾根良教授特别针对帕尔玛教授的特稿撰写的评论性文章。同时,本专辑还收录两篇有关演化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章,分别是贾根良教授关于“溯因法和回溯法:演化经济学的科学创造方法”的专稿和雷国雄博士的“从不可能彻底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到方法论演化主义”的文章。其余文章均为“第五届中国演化经济学论坛暨年会(2012年·山东)”的人选论文,其主题皆围绕演化与创新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具体内容包括演化经济周期理论和运用演化经济学思想对产学研协同创新实践问题进行的有益探讨等。总之,本专辑突出了与演化及创新经济学等国内外广泛关注的重要学术话题,也与我国制度创新深化与自主创新战略这两大实践主题相呼应。

本专辑可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提供学理思考与借鉴,可作为政府科技领域的高层领导、企业高级技术主管、大学与科研院所的科技工作者的参考,尤其适合作为管理学专业、经济学专业硕士生及博士生的参考用书,对于想了解 and 深入研究演化与创新经济学的读者也是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 第12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ISBN 978-7-03-045876-6

I. ①演… II. ①教… III. ①经济学-文集 IV. ①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4465号

责任编辑:马 跃 李 莉 / 责任校对:胡小洁
责任印制:霍 兵 / 封面设计:蓝正设计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年11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5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8 3/4

字数:220 000

定价:6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主 编

陈 劲

执行主编

王焕祥

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拼音排序)

安虎森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陈 平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何自力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黄少安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贾根良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罗卫东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孟 捷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王缉慈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王沛民	浙江大学科教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韦 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魏 江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吴贵生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吴晓波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姚先国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叶 航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张 钢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张旭昆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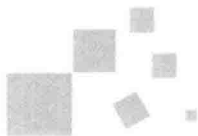
学术顾问委员会 (按英文字母排序)

Bengt-Åke Lundvall	丹麦奥尔堡大学
Eric von Hippel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Franco Malerba	意大利博科尼大学
Geoffrey M. Hodgson	英国赫特福德大学
Phil Cooker	英国卡迪夫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
Qingrui Xu	中国浙江大学
Richard R. Nelson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Ron Boschma	荷兰乌特列支大学地理学院
Ron Martin	英国剑桥大学地理系

编辑部联系方式:

电话:0086-10-62792422

邮箱:ei_review@tsinghua.edu.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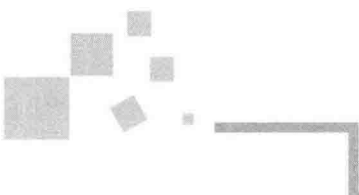
摘 要

《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致力于介绍近些年来在西方蓬勃发展的演化经济学以及该理论范式主导下的创新经济学,展现中国学者在演化经济学这一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中取得的成果,并为中外学者就演化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及其应用问题的讨论和对话提供平台。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专辑收录的论文,内容涉及了演化经济地理学及演化经济学的进展、金融发展及股市行为与创新的关系、政府行为的演化分析等主题,以及关于国家发展资本品工业和浙江民营企业的商业模式—技术创新问题。

总之,本专辑突出了与演化及创新经济学等国内外广泛关注的重要学术话题,也与我国制度创新深化与自主创新战略这两大实践主题相呼应。

本专辑可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提供学理思考与借鉴,可作为政府科技领域的高层领导、企业高级技术主管、大学与科研院所的科技工作者的参考,尤其适合作为管理学专业、经济学专业硕士生及博士生的参考用书,对于想了解和深入研究演化与创新经济学的读者也是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目 录

为何经济地理学不是演化科学? ——走向演化经济地理学	
..... Boschma R. A. Frenken K. 包卿译 (1)	
无繁荣的利润——股票回购如何操纵市场、抑制创新并恶化美国人的生活	
..... William Lazonick 张沛琳译 王焕祥译 (26)	
经济增长中的金融发展——新古典和熊彼特-凯恩斯框架比较视角的文献述评	
..... 蒋映泉 韩嘉怡译 (41)	
金融危机与经济学流派的实践检验	陈平 (57)
演化经济学面临思维转向——从生物演化到社会演化	朱富强 (73)
基于行为仿真模拟对演化政府行为存在性的检验	马文斌 蒋天哲 王崇斌 (89)
发展资本品工业的一种国家主义思路	张志 (94)
浙江民营企业 FDI 中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耦合的小规模技术优势升级研究	
..... 董榕榕 朱丽琳 裴梦莹 沈莉 (113)	

为何经济地理学不是演化科学?

——走向演化经济地理学

Boschma R. A. Frenken K.^① 包 卿^②译

摘 要: 本文首先阐述了过去二三十年在经济地理学领域发挥重要影响的新古典、制度和演化方法的异同。进行理论内容和研究方法的比较,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掌握三者之间方法的异同。当前显而易见的是创新性理论主要在新古典和演化理论之间(尤其在模型方面),以及在制度和演化理论之间的交叉领域(尤其在理解理论方面)。总的来说,我们认为演化经济地理学是一个不断呈现新鲜活力的经济地理学领域。尽管如此,目前演化经济地理学尚未能形成与其他理论方法相区别开来的独特理论方法。

关键词: 演化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 制度经济地理学

一、导 言

自从经济学进入“地理转向”以来,“方法论之争”便在经济地理领域不断的升温(Martin, 1999)。从20世纪80年代起,经济地理便开始脱离传统经济分析,利用对社会、文化和政治科学的洞察转向更加“跨学科”的一边。这种转向在经济地理学那里被归结为“文化转向”(Amin and Thrift, 2000; Barnes, 2001)或“制度转型”(Martin, 2000)。10年后,随着克鲁格曼(Krugman, 1991a)的一个开创性贡献,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已重返“经济地理学”(Fujita et al., 1999; Brakman et al., 2001; Fujita and Thisse, 2002; Puga, 2002)。当然这也遭到了经济地理学家们的顽固抵制。新古典经济学家们重新焕发了他们对“地理”的兴趣,而地理学家们却正远离经济学,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之间的争论鲜有结果,这种情形犹如“聋子之间的对话”(Martin, 2003)。

演化经济学可视为经济地理学的第三种方法,但迄今尚未受到真正关注。虽然,对演化思考和演化概念的溢美之词不断增加(e.g., Storper, 1997; Cooke and Morgan, 1998; Martin, 1999; Sjöberg and Sjöholm, 2002; Cooke, 2002; Scott, 2004),然而经济地理学目前还是很少系统性地应用演化经济学(Rigby and

^① Boschma 和 Frenken 均为荷兰乌德勒支大学教授,研究经济地理。

^② 江苏省江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科科长。

Essletzbichler, 1997; Boschma and Lambooy, 1999; Essletzbichler and Rigby, 2005)。当然,在经济地理学界看来,演化经济学自身也尚未发展为内在一体的理论与实践。客观公正地说,演化经济学家们比经济地理学家们更积极地将演化经济学引入经济地理学论题 (Arthur, 1987, 1990; Swann and Prevezer, 1996; Antonelli, 2000; Caniëls, 2000; Breschi and Lissoni, 2001, 2003; Bresnahan et al., 2001; Klepper, 2002a; McKelvey, 2004; Brenner, 2004; Werker and Athreye, 2004)。也许正是因为演化经济学在经济地理学领域的影响尚微,所以,经济地理学家们或多或少地对演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不加区别。

我们提出“经济地理学的演化方法”这一论题,与此相似的情形是,韦伯在其具有开创性的论文中指出:“为何经济学不是演化科学?”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提出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基本要素。在刻画出这一新方法的主要轮廓之前,我们要指出,经济地理学界的“演化经济地理学”是不能还原到新古典主义和制度主义的。为此,我们首先将概括出经济地理在过去几十年间的两大理论进展:一是20世纪90年代左右的新经济地理;二是20世纪80年代左右的文化或制度转向。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我们解释了两股思潮之间为何存在较大冲突,而不是相互交流借鉴。在第三部分,我们提出了三个议题,重现了经济地理学内部的分歧(经济学也如此)——讨论的假设、数学方法的使用,以及静态和动态的差别。在此框架下,我们探讨新古典、制度和演化方法的异同点。我们展现了演化方法的价值,并提出演化经济地理学实际上是“新瓶装新瓶”。为了展示演化经济地理学的新颖性,我们在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比较了新古典经济地理学、制度经济地理学和演化经济地理学之间的差异性。尽管这种比较尚不能够体现出系统性,但是显然是值得鼓励的,并且已经有很多成果。演化经济地理学方法是富有独特性的,这主要体现在它的核心假设、分析单元和解释风格方面。文章的最后部分,为了证实我们的论文观点,勾勒出了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基本轮廓。

在介绍经济地理学的三种方法之前,有必要指出的是,我们的目标不是讨论和比较每一种方法的具体细节(参见 Nelson, 1995a; Hodgson, 1998; Marchionni, 2004),因此,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回避”掉一些细微差别。我们主要参考了这三个理论的“教材文本”,这不是说“现代作品”都非常适合于这三个理论。相反,这提醒我们:程式化地区分这三种方法主要是为了使用方便,并最终有利于理论方法之间的融合。

二、经济地理学的方法论讨论

过去20多年间,经济地理学被认为经历了很多的“动荡”(Martin and Sunley, 1996; Amin and Thrift, 2000; Barnes, 2001; Meardon, 2001; Overman, 2004; Scott, 2004)。如果说经济地理学中新近有所“演化”,一般认为是由克鲁格曼等所开拓的新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地理学中的应用。接下来,我们以“新经济地理学”来专指这一新进展。我们也会使用“新古典经济地理”,借以包含了克鲁格曼之前的区域科学

和新近的新经济地理学进展,两者都是从新古典的“效用最大化”和“委托代理”假定出发,以“均衡分析”推导出模型,这些都类似于新古典经济学。

克氏的新经济地理学方法可以看作是新古典经济学对“贸易、专业化和集聚”解释的新拓展,缓解了常用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假设压力。这基本上是一种微观经济理论,它以“经济人的理性决策”解释了集聚的存在和持续。在假定企业层面的规模报酬递增以及企业层面的不完全竞争情况下,克鲁格曼的理论贡献表明集聚可以发生——不必假定区域差异或外部经济。尤其在交通成本下降的背景下,集聚和扩散均衡点的达成取决于企业和劳工是在集群中更受益还是扩散到更多区域受益。这个平衡点的转换是在企业内部规模经济和针对消费者的生产多样性经济——一方面是集群,另一方面是区域之间的运输成本。此外,克氏的核心模型具有多个方向的延伸性,包括其他因素,如人口稠密与失业(Fujita et al., 1999; Brakman et al., 2001; Puga, 2002; 更全面的综述参看 Neary, 2001)。

在克鲁格曼和其他经济学家着手提出他们的理论观点的同时,经济地理学家们也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研究。提及这一点,我们通常会指出经济地理学的“制度转向”这一变化。我们可以把经济地理学的“制度转向”看作是制度主义成功发展的一脉,其在经济学领域却鲜有成效。即使这样,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对“制度经济地理方法”尚未有充分论述(Martin, 2000)。同样的事实是制度经济学尚未形成内在系统性(Hodgson, 1998)。两者都被认为是一种方法的集中,在个性化事例上分享了共同的概念和兴趣(Samuels, 1995)。对于绝大多数制度经济学家而言,方法论和理论的多元化并不能推论出其内在不一致性。相反,多元化是方法论的核心,并受到鼓励,这一点至少在接受制度经济地理作为跨学科和综合科学的学者那里得到认可和接受(Hodgson, 1988)。

在其最为严谨的形式中,制度经济学方法提出“经济行为差异”的原因是“制度差异”(Hodgson, 1988, 1998; Whitley, 1992, 2003; Saxenian, 1994; Gertler, 1997)。“制度差异”表现于企业和地域间(前者以组织架构和商务文化为表现形式,后者表现为“法律框架、非正式制度、政策、价值观和标准”等)。以制度的视角对这些经济单元进行比较分析能够解释不同经济绩效的成因,如利润、增长、收入的分配和矛盾。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仅仅是对制度主义方法的部分解释。研究者可以区分“过度社会化”和“低度社会化”两种视角:前者认为主要是制度及社会阶层控制决定个体行为;后者认为是个体的理性行为塑造了制度(Granovetter, 1985)。如在经济学中,老制度主义经济学主要对应于“过度社会化”,而新制度经济学(Williamson, 1985)重在“低度社会化”(从这个方面而言,接近于新古典经济学)。我们经济地理学的制度主义方法倾向于“过度社会化”,因为很多的经济地理研究主要侧重于制度,而不是个体行为(Gertler, 1997)。

一直以来,新经济地理学和制度经济地理学各自保持了独立发展,也展开了一些讨论(e.g., Amin and Thrift, 2000; Martin and Sunley, 2001)。我们赞同马丁(Martin, 2003)的观点:富有成果的思想交流还鲜有发生。相反的观点认为,讨论已

经很激烈,不过没有进展而已。毫无疑问,两股思潮的基本方法存在较大差异。我们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冲突至少反映了两大不可调和性。

第一,制度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在方法论上存在差异,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接受了“空间”这一概念。制度经济地理学者拒绝使用模型和计量经济学规范进行演绎推理。相反,他们使用一种归纳的方法,通常是案例研究方法,突出“现实空间”的地方独特性。制度分析的一大目标是理解“现实空间”的“地方独特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这也是导致不同空间尺度下“地方特色制度”的原因。因此,任何一种制度分析方法在不同地方的展开是不同的,如在对起点的分析和“地方特色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发展方面。相反,新经济地理学在假定“效用最大化”和“委托代理”的前提下,使用模型进行演绎分析,利用“均衡分析”进行理论推定和预测。新经济地理学不认同甚至拒绝那种突出地方特色的案例研究(e.g., Overman, 2004)。新经济地理学忽略区域差异的存在,但事实上在“要素价格”或者“制度建制”上是存在差异的。再者,这些模型的建立起始于对“原子空间”的假定,目的是解释集聚是如何发生的。它们的主要目标是展现“不均衡的空间模式”是如何在起初“均质世界”中产生的,因此,他们从不同的“地方特殊性”和不同尺度的“空间集聚”中进行抽象概括。

第二,这两种方法在解释经济现象时存在“行为假定”的差异。新经济地理学的目标是从个体经济行为“效用最大化”中解释经济活动中的地理模型。制度经济地理学者则是假定:经济行为并非如“效用最大化”所言那样准确精致,而在“行为规范”框架下能够更好的理解。个体的理性是有限的,他们更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身在其中”的制度进行行为决策。“制度”根植于特定的地理空间实践中,这就要求区位(“真实空间”)和分析单元相联系。通过这样做,制度经济地理学分析了“制度的特殊性”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和由此形成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相反,制度在新古典经济学模型中不扮演任何角色,或者仅仅是一种模糊和不言而喻的感觉(如模型中特定相关参数)(Olsen, 2002)。地方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在分析模型中被遗漏了,因为这在经济分析中认为是不必要的,是认为应该留给社会学家们干的事情,克鲁格曼就是如此处置的(Martin, 1999)。

我们认为“演化经济地理学”不同于新古典和制度主义,应该被列为经济地理学的第三种研究方法。它在经济地理学背景下使用演化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和方法论,为主要经济现象提供了另外一套解释架构,包括集聚和区域增长差异。它的起点是解开“组织”的黑箱,且视“组织间的竞争”是立足于“与时演进积累”的“惯例”基础上的(Nelson and Winter, 1982; Maskell, 2001)。“组织演化模型”建立在两大概念基础之上——“有限理性”和“惯例行为”,而不是“效用最大化”(Simon, 1955a)。“惯例”可以理解为“组织技能”,但不能简单认为是“个体技能”的总和(Nelson and Winter, 1982)。在企业层面,“惯例”是显现的,这是因为在企业中的员工因为技能特长不同而有劳动岗位分工差异。对应于个体技能的“组织惯例”是由大量实践知识(干中学)和那些难于编码的“隐含知识”构成的。这就使得企业之间很难模仿(Teece et al., 1997)。因此,组织的多样性在于它们“惯例”的多样性,并持续作用。因此,

组织的模型化不再依赖于委托代理假设。正是这种多样性在经济发展处于可以变更和超越平衡的过程中丰富了选择 (Hodgson, 1999)。而且,组织在它们的“惯例”基础上展开竞争,竞争是立足于熊彼特创新所驱动并需要新“惯例”的新产品和新技能基础上的,而不是新古典模型所认定的生产成本。

总的来说,演化经济学揭示了“惯例”的分布——搜索和选择的结果 (Alchian, 1950)。首先,企业在试错过程中总结失败教训,当“惯例”不能良好运作时,失败会引致更为活跃的对“惯例”的搜索 (Nelson and Winter, 1982),如通过投资研发。演化经济学喻示绝大多数企业是在过去基础上不断增加创新和开拓知识的。经验研究表明创新提高了企业生命周期 (Cefis and Marsili, 2006),但组织转变是趋于降低企业生存概率的 (Anderson and Tushman, 1990; Carroll and Hannan, 2000)。组织在带着竞争的危险“拷贝”和“模仿”其他企业时,也通过网络来学习 (Cowan and Jonard, 2003),尽管模仿往往是失败的——因为“惯例”中的隐含知识是难于拷贝的 (Teece et al., 1997)。其次,“知识情报”是作为一个整体在产业层面存在的,正如生物界的种群 (Nelson and Winter, 1982)。只要企业展现了“惯例化”行为,市场竞争就如一个选择装置,它保留和放大精明合适的“惯例”,消除愚笨不合适的“惯例”。尤其,利润差异导致不同的成长率,这使得更合适的“惯例”在产业内具有优势。这种选择逻辑是与企业成长实践中自动纠错机制相一致的,这意味着一些企业能够持久成长 (Bottazzi et al., 2002; Cefis and Orsenigo, 2001; Cefis, 2003; Garnsey et al., 2006)。

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目标是理解随着时间变化“惯例”的空间分布。它尤其着力于分析空间中创新和新“惯例”的扩散,以及通过什么机制使得更合适的“惯例”扩散开来。遵循这种逻辑,空间集聚的出现既不是新古典理论所言的区位理性决策的结果,也不是制度理论所言的建立特定地方制度的结果,而是要以嵌入在组织“惯例”中的知识历史性地空间中成长集聚来分析的。沿着这个视角,就有几个演化机制使得企业产生空间集聚。

集聚可能是一个过程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偶然事件被企业层面的正反馈所放大 (Arthur, 1990)。因为通过学习,成功引致更多的成功,一些企业将成为幸运者并成长为产业领航者,而另一些企业是不幸的并最终消失。成功企业产生更多的、更成功的溢出效应,这些几乎都保留在区域内部。由此产生的产业和空间动态牵涉到企业和区域关系的路径依赖,一旦一种空间模式被历史性地“设定”,就会很大程度上不可逆转。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聚集经济,演化过程也可导致空间集中 (Klepper, 2002b)。空间集聚也可能是区域层面的报酬递增。知识不仅根植于企业的组织“惯例”中,而且也可能从一个企业传播到另一个企业。正如默认知识难于通过全球市场的联系而得以交换一样,知识溢出更多是在地理临近的空间中发生 (Jaffe et al., 1993; Breschi and Lissoni, 2003; Verspagen and Schoenmakers, 2004)。集聚经济既是一种激励机制,又是一种选择机制,它解释了经济活动为何驱使企业从其他区域集中到一些领先区域 (Malmberg and Maskell, 2002; Boschma, 2004)。

接下来,我们讨论演化经济地理学与新古典和制度方法的联系,它认同新古典的“规范建模”方法,而在行为基础上它认同制度方法(如有限理性)。考虑到这些相似性,我们可以预期沿着演化、新古典和制度方法之间的交集在经济地理领域进行丰富的思想交流。我们因此将具体讨论演化和新古典经济地理学之间的交集(第四部分)、演化和制度经济地理学之间的交集(第五部分),与这些安排相呼应,在第三部分,我们简要地描述了经济地理学的三个主题,这样有利于深入讨论过程中对这三种方法的交集性质有深入的理解。

三、经济地理学的三个主题

自我们从演化经济地理学那里获得一种有别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地理学的方法之后,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清晰表达出这三者在方法上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尽管任何试图从学科视野来刻画和描述其主要特征都是非常困难和复杂的,但我们感到这将是非常有益的一件事——将一个新方法和既有方法区别开来,以及表示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在思想方面更加亲近的关联。我们将通过以下三个主题加以介绍、展开——关于这些,我们以图1来描述。每个主题由三个方法中的两个组成,并与第三种方法加以区别比较。这三个主题再次一起在经济史和经济地理学史中被展示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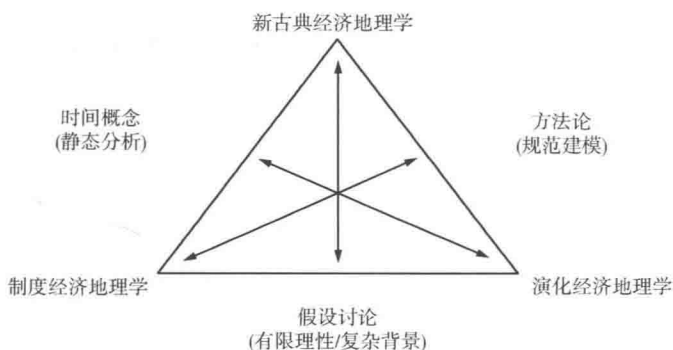


图1 新古典、制度和演化经济地理学之间的三个关键议题

第一个方面主要讨论规范建模的有效性。这部分主要讲述演化和新古典学者的主张,以及比较他们与制度学者的区别。前已述及,绝大多数制度主义学者拒绝规范建模,因为“它”不能把握住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Martin, 2000)。根据制度主义学者的意见,“规范建模”就如一个规则,这个规则采取了反现实的立场,因为它排斥了“地点的特殊性”因素(如文化和制度),这些是难以放入“希腊字母经济学”里的,却在解释区域差异时发挥了重要作用(Gertler, 1997)。相反,新古典和演化论学者以不同的途径采用“规范建模”作为理论化的工具。

第二个方面集中于理论假设的争论。演化和制度主义对新古典主义的“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假设持有一致的批评。正如Dosi(1984)曾经指出的:“我们必须放弃新古典框架,因为我们不能假定一个外在的、给定的背景和令人喜欢的要素要与人们的理

性完全一致。”相反,演化和制度主义学者认为经济代理人的理性是有限度的,他们的决策建立在规则和制度基础上(Veblen, 1898; Simon, 1955a; Nelson and Winter, 1982)。这并非说演化和制度主义学者就假定经济人不去争取效用最大化,而是因为真实世界中经济人因为有限理性而不能做到。相反,经济人必须依赖“惯例”(在微观层面)和“制度”(在宏观层面)。既然“惯例”和“制度”是特定背景所给定的——惯例特定于组织,制度特定于地域(真实空间),这两种方法都拒绝采用那种忽略人的行为复杂性的新古典理论的原子化视角。

第三个方面是关于时间概念。这方面演化论者对新古典和制度主义的“静态分析”持有批评立场。如果说演化理论是生物界的自然历史理论或者是经济学中的经济发展理论,那么它的特征是从历史解释事物的当前状态:“解释为什么一些事物的存在密切地依赖于它的历史。”(Dosi, 1997)因此,事情的当前状态演绎于并由它之前的状态所构成。演化理论处理路径依赖过程,这其中之前事件影响未来发生事件的概率。在这种视角下看,小事件会因为自我增强能够带来大的和长期的影响(Arthur, 1989)。概括地说,历史发挥重要作用(David, 1985)。这方面是演化方法与新古典和制度主义的基本差别,后两者都重视静态分析。

总的来说,新古典和制度经济地理学之间的冲突可以概括为两大基本差异,在方法论(规范建模的采用)和关键行为假定方面(有限理性和惯例/制度指导行为决策)。演化经济地理学持有中立立场:它认同新古典的规范建模方法,并把这种建模建立在“地方背景”的抽象概括和用制度主义方法假定有限理性以及侧重于人们行为决策的背景分析上。这看似模棱两可的定位可以从分析的不同层次来加以明晰:演化经济学视组织惯例为一个特定背景,以解释有限理性下的行为决策,而制度主义方法是从地域制度出发的。因此,演化经济地理学不是从宏观制度差异角度解释区域增长差异,而是从企业运行于地域背景下的微观历史出发来进行分析。

四、新古典经济地理学和演化经济地理学之间的交集

正如前言,近年来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地理学的影响已经发展出一派新模型——建立于克鲁格曼核心模型基础之上(Krugman, 1991a)。这些模型易于理解接受,但仅仅处理了地理的一些方面(尤其是交通运输成本),这使得其在多个场合被经济地理学者和其他学者所攻击,因为它们没有很好地处理“真正”的地理问题(e.g., Martin and Sunley, 1996; David, 1999; Amin and Thrift, 2000; Nijkamp, 2001)。尽管如此,新经济地理学被认为在空间不均衡发展理论化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认为,尽管理论基础有差异,但新经济地理学与演化经济地理学之间可能存在一些共同之处,而这些可以看作是两者之间的交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明确指出一种错误认识:认为这两者之间理所当然地存在“交集”。正如前面提出的,演化和新古典主义存在共同的建模方法论基础,包括对原子空间、锁定的可能性、不可逆转性等概念的使用,然而这两者在关键行为假定、分析的单元、时间的处理和集聚经济概念等方面

存在分歧。

新经济地理学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报酬递增模型大家庭中的一员,包括了增长理论、贸易理论和经济地理。这些新模型家族取代了原先的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以及完全竞争的假定——通过假定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这些假定更好地掌握了现代经济中绝大多数部门的特点——垄断寡头和大企业内在地实现规模报酬递增。对于演化方法而言,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新古典主义方法的最大不同是它通常能够以一种独特的优化均衡方式建立历史和可逆过程模型。相比来说,演化和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都是可能的多重均衡,在进入某一均衡过程中的路径依赖不可逆转的结果导致系统锁定和次优结果。

这两个方法的另一个共同特征是关注于解释不均衡空间模式是如何从均一的或“原子”空间中发展出来的。尽管回避区域差异,仍然试图解释空间集聚。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当消费者和企业预知到在某一区位集群会更有优势时集聚就发生了,这带来了运输成本最小化和利润与效用最大化(规模报酬递增、消费商品的高度多样化)。因为经济人的集群作用,精确的区位理论不能发挥作用。一个相似的问题占据了演化理论的思考。比如,假定新企业是溢出企业,每个企业具有同等的能力通过溢出去创造新企业,结果区位的动力机制可以建模为一个随机过程。相似的情况, Klepper (2002a) 解释了底特律为何成为美国汽车之都——使用溢出模型,假定“惯例”从母系企业到溢出企业得到“一以贯之”地执行,这意味着母系企业和溢出企业的生存概率是一样的。从“产业生命周期”模型出发, Klepper (1996, 2002b) 推导出相比后期进入者,早期进入者存在高生存概率,因为拥有更多的时间去改变他们的组织“惯例”。仅仅那些虽属后来但从先前“母系”企业中派生的企业能够克服后来者的逆势,因为这些派生企业继承了他们“母系”企业的合适“惯例”。因此,当派生企业和其“母系”企业布局在同一区位时,带有相同“惯例”的企业便在地理空间中成为集群 (Klepper, 2002a)。

以随机推理为基础的演化模型已经应用于空间网络的演化分析——空间中任何地方都可能演绎为一个新节点,节点之间的链接依赖于地理空间(消极性)和优选的联系(积极性)。优选的联系意味着一个新的节点更倾向于联系那些能从其中获益的节点 (Barabasi and Albert, 1999; Albert and Barabasi, 2002)。网络的空间组织和形态可以理解为纯粹的随机和就近选择的结果 (Andersson et al., 2003, 2006), 这种情况在基础设施网络中可以观察到呈现为“轮毂-辐条”式的集中放射状 (e.g., Guimerà and Amaral, 2004; Barrat et al., 2005)。相同情况,聚落体系中的城市,其历史性的增长网络模式是从潜在的联系中发展起来的结果 (Castells, 1996)。

因此,尽管演化和新古典方法在精密的模型技术和重要的理论假设方面存在极大的差异,但两者都采用假定的“原子空间”规范建模解释最初均质的世界是如何演变为不均衡分布格局的。尽管有这些共同特征,但演化经济地理学和新经济地理学至少存在这四个基础性的差异。

首先,新经济地理学坚持保留了新古典框架下的经济代理人“效用最大化”以及

经济人的同一性假定。这就和演化经济学理论极大地区别开来,后者是建立在不同的一组对经济人的假定基础之上的,包括有限理性、惯例行为和异质性。新古典模型假定一个给定了的市场结构(如新经济地理学的“垄断竞争”),而演化模型考虑了进入、退出和创新,并让市场结构自发地演进。换句话说,新经济地理学在现代产业组织方面比较薄弱(Neary, 2001)。

其次,这两种方法在集聚的经济层面存在差异。新古典模型侧重于宏观空间经济中经济人(企业和消费者)的区位决策——在微观层面假定一个给定的市场结构。由此,马丁指出新经济地理学不能解释“产业区位和专业化”在何地发生,或者为何在此地而不在其他地方。相比,演化方法目标是从中观经济层面解释产业空间和网络如何演化的。在宏观层面,经济体系的空间演化侧重于结构演变分析框架,在那里,区域单元的赶超或落后用要素的升降和空间网络结构加以分析(Hall and Preston, 1988),如在国家(Dosi and Soete, 1988)、区域(Boschma, 1997)或者城市层面(Hohenberg and Lees, 1995)。

再次,两大理论在处理“动态”方面存在差异。尽管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被认为是用来解释集聚的动态形成过程,但其结论建立在静态均衡分析基础上,就如其他新古典经济学模型一样。模型的预测是源自对所有单个经济代理人的一次性区位选择结果。如此,他们的共同行为是均衡的。在这些模型中,均衡中的变化是由外生而不是内生参数的变化所引发的。比如,运输成本的下降或者贸易壁垒的消除可能导致企业在一个区域集群,而不是在空间中均匀地分布。因此,真正的“动态”结果仅仅是“不同参数设置的不同均衡状态”的静止分析。演化模型不同于新古典模型,其经济“动态”仅仅展现为暂时趋于平衡的打断——由内生决定性创新型企业行为引发的(Nelson and Winter, 1982)。由“离经叛道”企业行为所引发的失衡趋势不被认为是“噪声”,而是驱动经济发展的潜在力量。演化经济学视“通过创新对超额利润的寻求(也称为‘熊彼特式竞争’)”为经济的基本动力(摆脱均衡状态),同时认为利润的流失是因为价格的竞争——仅仅被认为是第二位的动力(均衡的转换)。在模型化的语言里,这意味着企业能力的增长和下降,要素和区域可以明确地动态模型化——假定一些潜在随机过程去反映创新。沿着这条脉络,演化经济学开始更多地从“复杂理论”中借鉴采用“相互作用的代理模型”(for a review, see Frenken, 2006)。在经济地理学语境中,简单随机模型(Simon, 1955b; Arthur, 1987; Gabaix, 1999)和更加复杂的模型(Klepper, 2002a; Andersson et al., 2003, 2006; Bottazzi et al., 2004; Brenner, 2004; Guimerà and Amaral, 2004; Barrat et al., 2005)近来被更多的使用。

最后,新古典和演化经济学方法的一个决定性差异是关于集聚经济的基础理论。正如前面所述,新古典经济学突出对“集聚经济”的经济租金加以解释,而演化经济学则对集聚经济的知识外溢更感兴趣。从演化的视角来看,知识外溢推动了集聚经济的自我增强效应,企业在某一区域的布局产生和吸引了新企业同一区域布局,知识外溢来源于一群企业(Arthur, 1990; cf. Myrdal, 1957)。与此同时,知识外溢企业

对可持续的区域技术路径多样性至关重要,因为每一个专业技术的溢出都是从临近企业获取的(Essletzbichler and Rigby, 2005)。

在演化视角下,很多问题的提出是从知识溢出而来的(Feldman, 1999; Schamp, 2002)。其一,知识是以多种方式溢出的(模仿、抽资脱离、社会网络、劳动力流动、合作网络),问题之一是何种知识溢出机制最重要。在个案分析中,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知识溢出”网络区别于其他经济网络?且网络的中心性是否影响了主体对“知识溢出”的吸收能力(Lissoni, 2001; Giuliani, 2005; Giuliani and Bell, 2005)?其二,对于每一个“溢出机制”,我们可以分析:地理上的临近还是遥远,“催生出”了知识创造和知识溢出(Rallet and Torre, 1999; Malmberg and Maskell, 2002; Bathelt et al., 2004)。其三,演化理论着力于一个依然“有待求解”的问题,就是区域多样性(Jacobs, 1969)或者专业化是否更有利于“知识溢出”(Glaeser et al., 1992)。理论上,演化经济学认为多样性对“知识溢出”的发生更为重要,至少在知识方面为激进创新和知识的重新组合提供了支撑。该理论指出一定程度的相关多样性(界定为成员的基本能力)是有效的交互性学习和强劲的区域增长所必需(Frenken et al., 2005)的。此外,演化理论认为区域专业化的影响依赖于各自产业的生命周期阶段(Boschma and Wenting, 2005)。

五、演化经济地理学和制度经济地理学之间的交集

如前所述,把演化方法等同于制度分析方法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e.g., Martin, 2000)。这种关联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上述常见的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而非是因为演化和制度方法在基本原则上的完全一致性。这两个方法都拒绝“效用最大化”和“均衡分析”,共同致力于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角色。然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这不仅是混淆而且是误导,使得制度和演化方法在经济地理学内“等同化”。没有人会同意所有在制度经济地理学名义下的研究等同于演化方法,反之亦然。这一点对于那些评估特定制度安排的经济绩效研究非常真实,而其往往忽略了动态链接的演化方法作用。相反,相当一些有影响的演化研究在它们的分析中没有包括制度角色(e.g., Arthur, 1987; Klepper, 2002a; Bottazzi et al., 2002)。这样说来,演化和制度方法比演化和新古典主义方法拥有更多的“家族相似性”,因为它们在分析经济主体时都考虑了历史和地理背景(Bathelt and Glückler, 2003; Martin, 2003)。

前已述及,两者的不同之处是制度经济地理学对规范建模持批判立场,演化经济地理学使用其作为理论工具作“推导性假说”,而制度经济地理学倾向于不使用其进行演绎推理。举个例子,在区域研究中制度主义者呼吁“反还原论”定性方法,特别是深入的案例研究,以理解复杂多面的区域发展本质。使用定性方法或多或少遵从理论性质,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的核心概念变得难以操作,比如,在经济地理学中已经拥有影响力的“制度厚度”概念(Amin and Thrift, 1994; Keeble et al., 1999),因为无法准确测量,而被批评为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更遑论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可以

被确定和测试 (Markusen, 1999)。更普遍的是, 根据一些批评者的意见, 经济地理学中的制度和文化方法缺乏严谨性, 对假设的检验缺乏, 概念含混 (Martin, 2003)。因此, 制度方法在经济地理学中是理论上的重要贡献——通过提出新的区域发展解释和机制, 并在政策方面的影响——通过开拓“文化意义和地方历史遗产”新话语, 以及提出“根植本地经济生产有限转移论”观点 (e. g., Gertler, 1997)。

即使研究方法往往遵从理论前提, 但在所有情况下, 制度经济地理学定性研究方法的使用并不“自动地”跟随理论前提, 例如, 新近的网络分析方法, 可以利用社会网络分析的统计技术 (Wasserman and Faust, 1994) 和地图理论的建模技巧 (Barabasi and Albert, 1999; Watts, 2004)。然而, 在他们的纲领性贡献中, Boggs 和 Rantisi (2003) 认为“关系经济地理学”意味着“案例研究”——作为一项规则。因此, 有些人似乎先验地反对量化工具的使用, 即使理论贡献并不妨碍他们卓有成效地应用“量化工具”。同样的观察, 已经体现在马库森 (Markusen, 2003) 对“制度经济地理学家”的回复中, 她呼吁要超越归纳和演绎、定量和定性之间的对立研究。她的论点与演化经济学方法论基础是一致的, 其中结合了纳尔逊和温特 (Nelson and Winter, 1982) 所称的“理解理论”, 并从一开始就接纳了“规范建模”。

演化和制度方法的第二个更微妙的差异表现在它们对环境的处理上。演化的方法是从微观企业层面的组织惯例出发, 而制度的方法是从区域层面的制度着手。因此, 尽管双方承认经济决策中“背景因素”的重要性和拒绝“效用最大化”的新古典范式的核心框架, 但它们在对待作用于经济行为基础的“精确背景”处理上存在差异。对于每个企业, 组织惯例是特定的, 提供了一个微观背景, 它是公司过去的经验和活动的结果。相反, 制度是特定的社区和地区所提供的宏观背景。这种宏观制度背景可能对公司的惯例有相当的影响。从这方面来说, 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有着丰富的内涵, 它意味着, 公司的惯例将在分享同一个制度系统下的共性的同时, 使体系内部的子系统之间存在诸多特性差异 (Gertler, 1997; Hall and Soskice, 2001)。了解惯例的合适性不仅需要分析市场, 而且还有制度的相关制约背景。不得不说的是, 从演化的角度来看, 把制度作为经济分析的解釋变量是没有概念困难的。一方面制度可能确实限制了经济行为, 组织惯例不应与区域制度相冲突; 但另一方面, 制度的存在仍然允许企业之间组织惯例存在差异。因此, 以一个区域为分析单元是存在问题的——虽然具有一定意义, 因为没有理由假定事先的组织惯例是特定地区性的。有些地区可能以组织惯例同质化程度高为特征, 而一些地区不是这样。相反, 许多公司已经在不同的区域背景下建立多个据点, 尽管这些据点分享公司的组织惯例, 但一些组织惯例是适应了当地环境的 (Kogut and Zander, 1993; Cantwell and Iammarino, 2003)。因此, 尽管方法上存在前后关联性, 但演化经济地理学的主要兴趣是考量“地理”如何起作用, 并以什么样的方式起作用, 而不是理论上假定其在所有情况下都起作用。

让我们举例说明这之前已经提出的评点——关于处理“创新系统的方法”, 它是演化和制度概念在“地理”方面进行卓有成效交流的一个很好例子 (Freeman, 1987; Nelson, 1993; Edquist, 1997; Cooke et al., 1998; Cooke,